

1949年至1978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研究

姜长青

[摘要]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根据国家需要和区域资源禀赋等条件采取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实行了东北优先发展、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关系、建立经济协作区、实行特区体制和三线建设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区域发展战略,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一时期,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保障了国家安全。

[关键词]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

[中图分类号] D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1)01-0052-10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区域经济布局对经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从生产力布局、国家安全、资源禀赋等因素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整体性、时代性等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使中国的区域发展有了很大提升。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是以冷战为背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下实施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根据每个时期任务和工作重点,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多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经济先行发展战略,大跃进时期协作区战略,1960年代三线建设发展战略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战略等。这一时期,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保障了国家安全。

作者: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从东北优先发展到东北支援全国

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金属类矿产有铁、锰、铜、锌、金等,非金属类矿产有煤炭、石油、菱镁矿、油页岩、石棉等。本溪、鞍山一带的铁矿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东北地区的油页岩、菱镁矿、石墨、硅灰石、硼矿、稀土、钼矿的储藏量,皆属全国首位。^{[1](pp.43,73)}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长期为日本占领。日本在占领东北后,把东北作为建设重点,在14年的占领统治期间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建设了很多基础设施和大批工厂,工业发展基础条件较好。

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一次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东北的重要性,他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

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地。”^{[2](p.426)}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便向东北派遣了大量军队和干部,经过长期斗争和准备,东北全境基本解放。由于解放战争在其他地区还在进行,与全国其他地区相较而言,东北地区工业基础和矿产资源都占有相对优势。党中央对东北地区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让东北工作先走一步”方针,决定举全国之力帮助东北,让东北率先恢复发展。对此,陈云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东北跟关内有很大不同。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生产就恢复了。关内就不是这样,开一个工厂需要相当时间,一般说,从开始订机器到安装好机器,没有三年五年的时间是不行的。”^{[3](p.98)}

1950年3月,毛泽东在沈阳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出专家。我们现在从关内送一批知识分子来,以便将来给全国训练专家。”^{[4](p.99)}中央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安排在东北,其次为华东和华北,西北、西南的比重相对较小。周恩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肯定先解放的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在本地区经济恢复工作中的成绩,他指出:这次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绝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5](p.27)}

周恩来指出,东北的工业商业之所以调整得快,发展得快,固然是因为土地改革完成了,农村的购买力提高了,同时也决定了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中间桥梁——铁路的修复。东北铁路占全国铁路40%弱一点,全国铁路3万多公里,东北就有1万多公里。^{[6](p.59)}铁路的修复加

快了物资和人员的流通,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成为东北经济振兴的一个基础因素。在全国来说,工业的比例只有10%,90%左右是农业、手工业。东北的工业在去年就达到35%,今年可以达到43%,因为交通发达,工业发展,工业品可以深入农村,农村的粮食也可以运到铁路周围,大豆、高粱堆存仓库、堆栈。这是一个先决条件。^{[6](p.59)}而铁路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债发行筹集的资金支持。

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78.36亿元,东北地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接收的国家投资总额为25.8亿元,几乎占中央政府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是国家工业化建设投资最多的地区。在这一时期,苏联向我国提供援建项目42个,其中30个设于东北。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东北等的定位是,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使这个基地能够更有能力地在技术上支援新工业地区的建设,除了对于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作重大的改建以外,东北各工业区的原有工业,如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吉林的电力工业,也都将在五年内加以改建。^{[7](p.331)}

苏联援建的156项项目中有三分之一多被安排在东北地区,限额以上694个项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放在了东北。“156项”在东北的投资,极大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发展。围绕这些重点项目,东北还建设了大量的配套项目。东北投资建设的这些项目和企业,大体为苏联20世纪40年代的设备与技术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水平相对低一些,建设的项目以

重工业为主,主要为能源、钢铁与机械制造等。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东北地区初步建成了能源、钢铁、汽车、机床、机械制造以及国防军工等产业基地,工业门类已经比较齐全,产业体系成龙配套。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东北的产业结构,而且对全国产业结构的逐步完善和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项目企业有部分在“一五”计划时期开工投产,对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形成了很大支持。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中央改变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优先发展的方针,转而要求东北支援全国建设。195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干部大会上做的报告,指出:“东北发展潜力很大,生产任务很重。过去几年,全国支援,把东北建设起来了,现在应该轮到东北来支援全国了。东北要尽一切力量支援全国过关。北戴河会议时,富春同志提出的东北的方针,大家赞成,就是‘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逐步合理发展’。”^{[8](p.401)}这说明国家对东北战略定位的变化由优先发展逐步转到支援全国建设方面来。

二、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关系

中国有着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都面临着沿海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内地却发展很慢的区域格局,这和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有关。沿海按当时的说法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靠近大海的省份以及个别内陆省份靠近海洋的区域。

1949年,沿海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1.5%。另外,工业布局也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上海的轻纺工

业比较发达,日用百货供应比较突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0月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派遣第七舰队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沿海一带处于高度备战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始终处在高度备战备荒的情况下,为规避战争破坏的风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投资重心都放在内地。

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国内经济建设部署,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中国实行了边打边稳边建的建设方针。具体来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军工和国防工业占了很大比重。由于中国海军和边防力量相对薄弱,为保证投资安全,广大沿海地区安排大的建设项目很少,这就很难利用沿海较好的产业基础,造成了经济运行中效率相对不高,一些沿海地区的生产潜力无法发挥出来。

李富春在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做题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关于中国的产业布局,他指出: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在全国各地适当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布局适应巩固国防的要求,逐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这是有计划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任务之一。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对地区布局做了比较合理的部署,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并支援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9](pp.144-145)}在华北、华中、西南等地大量投资,是改变中国产业布局不合理、经济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工业布局大量在内

地,对于沿海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应怎样处理?1956年3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过程中,对沿海与内地关系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他结合苏联的情况指出: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关于沿海地区工业,毛泽东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势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10](p.540)}3月3日,毛泽东听取轻工业部汇报。在听到关于对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的汇报时,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汇报到上海地区不做大的扩建时,毛泽东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10](p.541)}

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等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指出:许多新产品都是在沿海工厂生产,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10](p.561)}4月19日,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他说: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他指出,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

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10](p.562)}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关于沿海与内地关系,他指出: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1](p.298)}沿海与内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比例为46.7%:53.5%,1958、1959年内地投资比重进一步增加,1958年内地投资的比重为50.76%,1959年为63.81%,两年内地投资平均超过了60%。

随着对国内外形势认识的深化,中国改变了在沿海不进行新的较大项目投资的观点。1959年12月15日,毛泽东等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读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1957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时间。1958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发展,对经济发展

①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①这里毛泽东用“耽误了七年时间”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政策和布局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是没有经验,另一方面严峻的国际形势也使国家把国防安全放到了突出位置。

三、设立全国范围经济协作区

为加快经济发展,在财政等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党中央也在酝酿调整中国的经济区划。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地理呈现出很强的区域性特点,经济建设中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更好地进行工业布局和经济布局,这无疑会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增强经济发展实力,并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城乡交流和正确处理沿海内地关系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为了更快实现经济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思考,他联系战争期间军队协同作战取得优良战绩的历史经验,在吸收其他同志意见的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协作区。

1957年年底,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作方面的6条指示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传达,其中第2条指出:以一个大城市为经济中心结合周围省市考虑通盘的协作规划,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经济区。全国形成六大经济区,东北地区以沈阳为中心;西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华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中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华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西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等协作区域。^{[12](p.135)}

为改变条块之间关系不畅的现状,建立结构和布局比较合理的地方工业体系,使地方工业产值在几年内超过农业产值,不但要发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也要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尽快在各地建设大型工业项目,形成若干个具有独立完整工业体

系的大协作区。通过协作增强建设力量,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是1958年前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想法。

1958年1月3日、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提道: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并要求各省在工作中相互支持,从全国大局出发。^{[13](p.273)}党中央1958年2月6日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7个协作地区;由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举行经济协作区定期性的和不定定期会议,促进各地协作交流。^{[14](p.135)}1958年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要求,协作区会议每两个月一次,……为的是全年抓紧一点。^②

协作区成立后,由于没有具体负责的机构指挥,其作用发挥很有限。对此,赵尔陆向毛泽东建议:考虑各协作区成立党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设置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和中央局的办事机关。^{[15](pp.251-252)}成立协作区的办事机构,协调协作区的工作安排,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协作区功能。

赵尔陆的建议被部分采纳。党中央于6月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指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必要人员构成协作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协作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协作区经济计划办公厅,其要接受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指导;由每个协作区指定一位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担任协作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4](pp.300-301)}由于缺乏权威性,协作区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开过一些会议,但它是个协调机构,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

1958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发布,对各协作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规定如下:组织本协作区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采取积极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②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措施,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本协作区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本协作区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编制的计划草案,进行综合平衡和必要的调整;在保证完成国家各项调拨任务的条件下,在本协作区内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组织生产、建设、培训干部和其他方面的协作,以及进行物资、商品、劳动力、投资等方面的调剂工作。^{[14](p.440)}这明确了经济协作区的主要职责和任务。由于各地都想在工业建设中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当时地方的各种资源都比较紧张,很难拿出多少东西“协作”,有的省市甚至想要别的省市的资源,协作很难有实质性进展,建立经济协作区的初衷没有实现,甚至导致各地区自我封闭和经济产业结构趋同化倾向出现。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方便有效实现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决定重建6个中央局,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对此予以批准并通过。中央决定成立6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6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较完整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至此,原来作为工作协商机构的协作区由具有实际权力的中央局所取代。

四、特区设立与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中国周边环境严峻复杂,依据对当时国际环境的判断,毛泽东在1964年5月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思想。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勘探技术和地质理论等方面进步较慢,中国一度还被扣上“贫油国”的帽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石油是少数几个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的工业品种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把石油工业作为重点发展行业,加大了国内石油资源勘探的力度。1959年9月大

庆油田被勘探发现,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缺油的局面,这对广大石油职工和全国人民都是很大的鼓舞。大庆油田在建设过程中采用新的组织方式,三年时间就初步建设起来。到1963年,大庆油田原油生产已经能够满足国内需要。这年底,新华社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石油实现了自给。

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党和政府特事特办,对大庆油田实行了灵活的管理体制。1964年3月31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后,石油部党组、黑龙江省委将《关于成立安达特区及所辖范围的报告》提交至国务院。6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安达特区,撤销安达市。由于大庆石油会战涉及全国石油系统及有关省、市、部、委,可支配的资金有限,为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需要采用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大会战期间的组织领导由石油部党组挂帅,亲临前线,统一指挥。11月19日,《关于安达特区机构设置的通知》由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发布。

1965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安达特区成立,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特区政府与会战工委、特区工委、会战指挥部合一,在领导企业的同时又行使政府其他社会职能。以石油工业部为主,领导政府中有关企业的工作。这些决策初步解决了中央部门和地方在开发建设大庆油田工作中的职责作用等问题,对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进行是有利的。

安达特区实行政企合一的领导体制加强了政、企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矿区市政建设统一规划和管理及工人生活统一规划和安排,同时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大庆石油会战的特殊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是一种企业领导与地方行政领导合二为一的领导体制,是党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重要创造。安达特区在20世纪60—70年代基本实行这种领导体制。

这个时期,以特区形式管理的还有三线建设的攀枝花。鉴于国际形势不断恶化,中国加大了对工业布局的调整以适应备战的要求。1964年5月,毛泽东根据几次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问题汇报时指出:存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三线工业基地建设要搞,进行经济建设一、二、三线战略布局,进行备战。^{[16](p.843)}

1964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听取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1965年计划安排问题汇报,由李富春汇报,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在李富春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指出:总而言之,向云贵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搞攀枝花、酒泉、长阳三个基地。酒泉钢铁基地的规模不要太大了,一百多万吨够了。铁矿多,可以拉出来另建。当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当汇报到上下不要对口时,毛泽东说:对,就是这样。^{[17](pp.420-421)}三线建设改变了国家经济工业布局和投资结构,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势必产生一定影响。

1964年下半年开始到1965年,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达300余项。第一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工厂有49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南三线地区规划布局;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在西北三线地区规划布局。经济调整中一度严重削减的基本建设开始重启,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1962年的18.2%回升到1964年的31%和1965年的34%。^{[18](p.152)}

国家的经济建设费从1962年占财政支出的50%上升到1965年的54.5%。因为经济调整过程中,国家把主要经济管理权收归中央,

经济建设的支出很大一部分由中央承担,所以中央经济建设支出占了很大比重。中央财政在整个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增加是必然的。1965年的基本建设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29亿元,总投资133.9亿元,三线建设投资为42亿元,三分之一偏弱一些;三线大中型项目中187个占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19](p.58)}这个时期,各省的小三线建设也开展起来。

对于地方小三线的建设,毛泽东也很重视,1965年10月10日,他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指出:“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20](p.341)}这里,毛泽东把大小三线建设同备战反修等重大战略问题联系起来,无疑促进了三线建设投资增加,速度加快。据统计,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地建设投资总额为611.15亿元,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为482.43亿元。1964—1971年,全国共有380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迁到三线地区。^{[21](p.183)}

作为三线建设重要当事人之一,谷牧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三线建设“总计国家投入了1200亿元的资金,在陕、甘、宁、青、云、贵、川七省区和豫、鄂、湘三省西部进行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建设,由于上得急,铺的摊子大,后又加上受到‘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还有林彪强调‘山、散、洞’的影响,确有不少损失浪费。但是,它毕竟在三线地区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项目,逐步形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包括以电工器材、棉纺为主体的陕西关中工业区,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大型水电站为主体的甘肃兰州工业区,以重型机械、电子为主体的四川成渝工业区,以攀钢为主体的攀西工业区,以六盘水煤矿为代表的西南、西北几个大能源基地。成昆等五条铁路干线的建成通车,使西南交通闭塞的状况为之一变。同时形成了以交通、能源、基础工业为依托,各具特色的几个国防工业大基

地。”^{[22](p.220)}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布局,增强了中国国家安全能力,促进了一批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扩大了工业基础,增强了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为西部地区开发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1965年10月12日,李先念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粮食、物价和财政问题再次发言指出:关于财政问题,第一合理,第二道歉。为什么合理?因为要搞大小三线,要援越,所以把各地的收入增加了一些,是合理的。但这就挤了地方,要道歉。但我们还是准备适当调整一下。^{[23](p.260)}

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进行了2000多亿元的投资,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支出,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0%多,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等,经过长达16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建成了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和学校等单位,初步建成了30多个工业城市和40多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在三线地区初步建成了以军工为主、门类相对齐全的产业体系。

三线建设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纵深,增强了国家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另外,大规模基本建设和人力迁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经济布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抓住战备契机,要求各省根据条件建设自己的小三线。三线建设头两年推进的势头很好,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很大,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三线建设的领导班子中,不少人遭到迫害批斗,如彭德怀就被从西南带回北京进行批斗。大批三线建设干部由于各种原因被审查,很长时间不能重返生产岗位。武斗风潮也波及三线建设工地,一些机器设备和生产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科研人员受到批判,科研场所遭到破坏,致使一些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科研项目停滞不前。

20世纪70年代前期,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三线建设基本上不再进行项目扩张,而把建设重点放在了搞好续建和配套工程。1975年,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对三线建设的部署进行了积极调整,强调三线对所在地方的发展应作出贡献:“许多三线的工厂,分散在农村,也应当帮助附近的社队搞好农业生产。一个大厂就可以带动周围一片。”^{[24](p.28)}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国家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了沿海地区,三线建设基本上结束。

三线建设对于改变中国内地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基础工业薄弱以及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等落后状况有很大帮助。一批工业城市纷纷建成,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这些城市过去属于非常落后的边远区域,经过三线建设大都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形成了以钢铁工业、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以及一些重要科研项目等为主的战略后方基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防纵深。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1975年的2亿多吨;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1975年的635亿度。攀枝花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都是这一时期建设的重点钢铁企业;四川西昌则成为重要的航空科研基地。西北三线建设也建成了一大批工业项目。

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三线建设通过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建设了一大批工业城市和工业项目;通过人员资金的汇聚,带动了内地经济发展,促进了内地省区各方面进步,改变了经济布局和城市布局。铁路开通、基础设施改善,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为后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先念指出：“当时建设三线的气魄很大，速度很快，确实振奋人心。三线建设从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来看，也是应该的。”^①1983年12月27日，李先念就有关三线建设问题致信赵紫阳：三线建设花了一千多亿元，不仅有国防尖端和常规兵器工业，民用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很多技术设备都是比较好的，技术力量也比较强；不少厂矿已经建成，发挥了作用。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受到林彪提出的“山散洞”的干扰和破坏，不少工矿企业确实需要调整和改造。但就整个三线建设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25](p.224)}1984年1月，中央召开第一次三线建设调整会议时，李先念给会议写了一封信指出：对三线建设要肯定，不仅建设了国防工业，而且把工业建设从沿海推向内地，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布局。这次会议确定了对三线工业分批进行调整改造的方针。^{[25](p.227)}

五、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加快发展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但面积大、人口多，而且民族构成也比较复杂，共有56个民族，汉族人口最多，除汉族外的55个民族都是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和数量非常多，宗教信仰和文化也富有多样性，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别很大，民族之间的主要分布地区也呈现很大差异，汉族主要居住在沿海和中部等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于边疆地区，范围包括从东北、西北到西南的广大区域。尽管处理好民族关系难度较大，但对中国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①参见采访李先念原秘书程振声记录，2009年7月29日。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问题，十分重视民族地区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根据不同的条件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领袖成为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民族问题更为重视，考虑问题也更为深刻周全。1950年1月1日，刘少奇在关于处理藏民部落等少数民族事务问题给西北局、西南局的指示中提出：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必须细心，向各少数民族表示好感，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保护他们的利益，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干部。他们内部制度的改革只有等干部等条件时再进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较早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

周恩来1950年4月28日在讨论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政务院会议上发言指出：少数民族工作要重视，在经济上政治上关心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重演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要稳步推进。^{[5](pp.36-37)}6月26日，周恩来在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的政务院会议上发言指出：“按《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去做，各民族必定能够日益团结和有美好的前景。要让少数民族同胞在贸易方面多得一些利益。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建设和轻工业工厂开办方面应该多搞些，应请示大行政区或者中央关于涉及民族重要事情的事情。”^{[5](pp.50-51)}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有相关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从法律制定方面切实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中国的工业化

发展给予大力支持,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党和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了出来。毛泽东以苏为鉴并结合中国实际,对国内相关政策进行反思,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谈到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些处理不当,要接受苏联教训,在国内民族工作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教育,要经常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弥补民族隔阂,对少数民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进行帮助。应该采取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使各民族团结一起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①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26](p.77)}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对少数民族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坚持正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充分照顾各民族利益,各民族自治地区发展是好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成功有效的。

[参考文献]

[1]李振泉等.东北经济区经济地理总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8]邓小平文集(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9]李富春选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2卷)(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8]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19]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1]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2]谷牧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23]李先念年谱(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5]《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李先念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澄宇

^①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On Xi Jin-ping's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tasks on which Xi Jin-ping has spent most of his energy. A procession from local-conditions-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precise measure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its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ecision as the ke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strategy that has guid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to great success and a great historical victory in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At present, the essence of "precision" contained in the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important guidance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Plan period and on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Cao Ying-wa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Core Cod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Epidemic: Leadership is a highly tension-imbued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centrally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ideological leadership, mass organisation and social appeal proposed by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n crises or even disaster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saving the day and turning the tide.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anti-epidemic struggle has once again proved that the incomparably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most reliable backbone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the storm strikes.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was the overarching forc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epidemic, it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provide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fight, its organisational strength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fight, and its social appeal created a positive atmosphere for the figh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core code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Guo Qing-so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a's Pathway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 are two main points in scientific socialism: one is communism and the other is internationalism. The pathwar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es not abandon these two points, but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dictate that China can only adopt the strategy of "retreating to advance" and make a roundabout way towards the goal of communism.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part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China". It is a demand for us to move from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o a higher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the "communist" and "internationalist" nature of the CPC dictates that we should constantly uphold the unity of the common ideal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ofty ideals of communism. (Ma Yong-jun and Tao En-qian)

The Original Mission an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Origin: An Analysis of the Grand Historical Theme of Mao Ze-dong's Establish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on July 1st: The year of 1938 witnessed the first anniversary in histor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birthday of the CPC.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on July 1st derived from Mao Ze-dong's speech "On the Protracted War", delivered at the Yan'an Anti-Japanese War Research Institute on May 26th, 1938.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solemn celebration of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n 1936 was prelude,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did not follow it up with a celebration of the 16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reflecting their modesty and generosity. Historically,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It is the historical essence of Mao Ze-dong's establish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on July 1st, and reflects Mao's decisive thought of "taking the lead rather than the back seat, and commemorating two themes". (Wu Hai-yong)

The Dimensions of Comprehensivel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current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s basically at the stage of micro-examination, lacking a macroscopic system construction. To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CP,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the stag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he placement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a certain spatial context),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the basic norms of political sciences observed by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he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Also,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inevitabil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arty establishment, to build a grand "historical view of party founding". This will help to scientifically answer many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effectively bridge the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views in researches, and thus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Xu Guang-shou)

Responsive Empowerment: A Study of Rural Women's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on the Basis of an In-depth Survey of Domestic Women's Oral History: In the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have undergone three important reforms of empowerment: land reform,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Meanwhile, rural women's land property right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the absent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nominal to the real, a steady increase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A long period of historical review and comparison reveals that the realisation of rural women's land property rights results from the "responsive" empowerment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 details in women's oral accounts show that their 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still subject to the erosion by social power characterised by culture which requires further update and reinforcement in the new context. (Yu Li-juan and Liu Xiao-ho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from 1949 to 1978: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dopted 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national needs and regional resources and other conditions. China implemen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ast and the interior, establishing economic collaboration zones, implementing the special zon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Line, and ethnic regional autonomy, which profoundly changed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of China.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mplemented by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generally successful, promoting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Jiang Chang-qing)

Always Sharing the Destiny with the People: The Sacred Mission of People's Leader Mao Ze-dong: Mao Ze-dong was the leader of the